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静”中之“动”

张 叉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评论界一般习惯于把“静”同陶渊明和华兹华斯联系在一起,似乎“静”是其精神气质的全部,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在陶渊明和华兹华斯“静”的面罩之下还掩藏着同等重要的“动”的一面。“动”是他们心理矛盾引发的心理波动,在内涵上丰富多彩,在消解方式上多种多样,在其文学创作中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陶渊明;华兹华斯;心理波动;心理矛盾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5-0087-09

陶渊明(365 - 427)和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 - 1850)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前人已对他们作过很多富有成果的研究,但尚有些领域需作进一步探讨。比如,评论界一论及他们,一般习惯于把“静”同他们联系在一起,似乎“静”就是他们精神气质的全部。实际上,“静”只是他们精神气质中重要的一面而绝非全部,在他们的精神气质中还有同等重要的“动”的一面。关于陶渊明,龚自珍评他“二分《梁甫》一分《骚》”[1](《己亥杂诗》),谭嗣同说他“慷慨悲歌之士也”[2](《报刘淞芙书二》),鲁迅也说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3](《“题未定”草六》)。关于华兹华斯,季亚科诺娃说他“以同样愤慨和悲伤的心情看待出卖自由的法国和力图去奴役法国的英国,看待在他眼中已经声名狼藉的理想和受粗暴的政府怂恿的无知而自私的人们对理想的嘲弄。”[4](44页)金东雷说他“有革命的思想 and 热烈的情绪,

……失望、悲哀、颓丧都抓住他的心坎”[5](227页)。王佐良也说“除了一个行吟湖畔的华兹华斯之外,确是还有一个歌颂自由、反抗暴政的弥尔顿式的华兹华斯。”[6](73页)在陶渊明和华兹华斯“静”的面罩之下,显然还掩藏着“动”的一面。但是,评论界多把关注点放到了他们的“静”的一面,对“静”中之“动”虽有初步认识却未予足够重视。至于把两人之“动”加以深入之对比研究者,则更未有所闻。鉴于此,本文试将他们“静”中之“动”作一对比分析,姑以为抛砖引玉之论。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静”中之“动”,是指他们的心理矛盾所引发的心理波动。他们的心理矛盾从内涵上看是丰富多彩的,主要有:入世与出世、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生存与死亡,等等。

收稿日期:2000-03-01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 1998—1999 年度重点科研项目[校科研(1998)文科 1—17 号]。

作者简介:张叉(1965—),男,四川盐亭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一)入世与出世。陶渊明入世与出世的心理矛盾集中体现在对入仕与隐居的取舍上。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对于士人而言,入世以求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和机会是非常单一的,入仕几乎是其入世之唯一选择。孔子认为,入仕是士人天经地义的本分,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出路,“学而优则仕”[7](《子张》),“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义也”[7](《微子》)。孟子进一步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8](《滕文公下》),干脆把“仕”当作士人的职业,入仕就是士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舍此别无更好的选择[9](72页)。陶渊明早在青少年时代就胸怀入世志向,故在诗中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10](《杂诗》其五)“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10](《拟古》其八)其入世之志主要有广济苍生和收复故土两个内容。他在诗中写道:“袁安因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10](《咏贫士》其五)“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10](《咏贫士》其七)袁安、阮公、黄子廉皆道德高远、为官廉洁之士,他在此一一称赞,表明他胸怀以他们为榜样去广济苍生之志。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值东晋多次北伐之际,383年的淝水之战和东晋末年的刘裕北伐是其中最著名的两次。在这种形势之下,他自然希望能参与收复故土,立功边陲,为国壮威。前引“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诗句即是他想象自己纵横边疆收复故土的情形。惜乎东晋王朝偏安东南,缺乏完成统一大业之决心和力量,陶渊明的从戎理想被敲得粉碎。

在中国封建社会,向有“官场险恶”之说。官场中的诸种关系盘根错节、犬牙交错,为官者须随时处于戒备状态,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11](《小雅·小旻》),倘稍有疏失便可能埋下祸患,轻则影响仕途,重则危及生命、祸及家人。为官者还须融于世俗社会,通谄迂回之术,否则便难于在官场立足,更谈不上飞黄腾达。陶渊明虽胸怀入仕之志,但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10](《与子俨等疏》),是个秉性耿介、高蹈独善之人。古人云“论至德者,不和于俗”[12](《更法》)。陶渊明孤介清高的个性给他的入仕造成了

极大的困难,使他在入仕与归隐的抉择上进退两难,矛盾痛苦,故云“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10](《杂诗》其二)。一方面,他想实现抱负,大展宏图,但又不肯汨泥扬波,与世俗周旋,“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10](《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另一方面,他要全身远祸,保持人格的自由,但又不时受到壮志未酬的烦扰,“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10](《杂诗》其二)。随着入世屡屡受挫和年纪不断增长,他的壮志逐渐消磨,“此心稍已去”[10](《杂诗》其五),但其入世之心并未完全湮没。韩愈说他“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13](《送王秀才序》)。杜甫说他“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14](《遣兴》其三)。谭嗣同说他“非无意于世者,世人惟以冲淡目之,失远矣”[2](《报刘淞美书二》)。鲁迅说他“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15](《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吉川幸次郎也说他“被误认为淡泊的隐士,其实乃是一位满怀浓烈热情的人物”[16](《陶渊明》,178页)。陶渊明自述道:“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10](《杂诗》其五)在另一诗中,他先自责废学耽饮,“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最后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10](《荣木》)即使在完全隐居后,他还写出了《读〈山海经〉》其九、其十和《咏荆轲》这样雄壮刚健、豪迈悲慨的诗歌。夸父、精卫和刑天最终都失败了,但在他们身上却散发出了一股豪迈悲壮的英雄之气,表现出了为实现宏伟抱负而不畏艰险、不惧强暴的抗争精神。在这些失败了英雄人物身上,寄托着陶渊明身在山林田野而犹望能有所作为的豪情壮志。

陶渊明的仕与隐体现了儒家和道家在理论上的冲突。儒家主张积极入世,道家主张消极避世,二者在理论上是矛盾的。儒家本身和道家本身在理论上各自亦有一定矛盾。儒家主张在政治清明时,应积极入世,大展宏图;在政治黑暗时,则当激流勇退,洁身自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7](《泰伯》)。道家主张出世,但《老子》却又诲人以入世之诈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17](第二十四章)。由于儒道之间和儒道本身在理论上具有矛盾,在儒道思想影响下的士人常常感到在入世与出世间何取何舍,抉择艰难,如“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18](《大壮》),表现出游离两端的心理。陶渊明深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在儒道思想的多重挤压下,其生存空间只剩下一条夹缝,这是入世与出世使他产生巨大的心理矛盾的重要原因。

华兹华斯入世与出世的心理矛盾集中体现在对革命的态度上。他早年对资产阶级革命怀有崇高的理想,《罪恶和悲伤》(*Guilt and Sorry*)一诗便反映了他明显的民主倾向。他认为革命是人的权利和本性产生的自然结果,因而对君主政体和贵族政治感到气愤,故云“阿谀产生恶习,显贵践踏劳动”[4](43页)。由于胸怀革命理想,他希望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法国革命一爆发,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两度亲赴法国,对革命表示热忱的欢迎、深切的同情和全力的支持。他还写诗歌颂道:“幸福呵,活在那个黎明之中,年轻人更是如进天堂!”[19](《序曲》,72页)“破坏之后,一座金殿拔地而起……”[20](《漫游》,59页)但是,残酷的现实把他的革命理想打得粉碎。随着法国革命的深入,英国国内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很多共和主义者都公开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现出了变节嘴脸。而以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为首的雅各宾派在法国掌握了实权后,对吉伦特派进行了大量的血腥屠杀,以丹敦为首的右派集团和以埃贝尔为首的左派集团均被镇压。华兹华斯在法国的许多好友曾对革命忠心耿耿,但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他本人因提前回国,方幸免于难。革命的一系列血腥与暴力使他对革命既震惊又害怕,白天沮丧,夜不能寐,恶梦中出现“绝望和暴虐的可怕景象,还有那死亡的刑具”[6](82页)。加之他的恋人安内特·瓦郎的家又是一个保皇主义家庭,他的革命信仰随之动摇,革命理想随之瓦解,“剧变都危险,一切机会都不可靠”[6](《无题》,74页)。1792年他从法国返回英国,革命理想破灭了,入世之道不通了。不久,他来到英格兰北部湖区隐居,走上了出世之路。但华兹华斯回国后仍对革命抱有一些信心。他关心政治,如饥似渴地阅读诸如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

这样思想激进的著作,同时还成了政治学家威廉·戈德温的信徒,常常和他谈论到深更半夜。他在《一个共和派致兰道夫主教的信》中,驳斥了兰道夫主教责难革命的谬论,明确表示自己反对专制主义、拥护法国革命的立场。他同柯勒律治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完成于他放弃革命手段之后,但他在歌谣集的许多诗篇中依然流露出了革命的倾向。他在《早春命笔》(*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一诗中认为,天地中的万物互相爱护,天地是仁慈的,而自以为文明的人却对物残酷对人也残酷,人是残酷的,“我岂不更有理由悲叹/人这样作践自己”[21](235页),这既对法国革命理想之一的博爱说仍持肯定态度,又对革命所体现出的理性主义表示怀疑。他在《伦敦,1802》(*London, 1802*)一诗中,歌颂了热爱自由的弥尔顿,也表明他没有完全放弃革命理想。一方面,他对法国革命已深感失望,心灰意冷后才隐居湖畔,没有象革命初期那样热情洋溢地歌颂支持革命。另一方面,他虽身在山间湖畔,但也时刻在对革命进行反思,对革命理想并未全盘否认。他在入世和出世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的游离性,只不过他的这种游离性没有陶渊明的那么强烈而已。

(二)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陶渊明的社会理想是古代传说中上古的伏羲、神农之世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之世。在其理想社会中,环境幽雅秀美,经济自给自足,民风朴素真淳,人民安居乐业。但是,他生活的年代正处于东晋、刘宋之交,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非常尖锐,社会动乱黑暗,“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10](《感士不遇赋》)。正直的人没有出路,朝堂上“雷同共誉毁”,“咄咄俗中愚”[10](《饮酒》其六)。朴素纯真之风丧失殆尽,“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10](《饮酒》其二十)。天灾人祸不断,许多人死伤流离,不少村落沦为废墟,“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10](《和刘柴桑》),“此人皆焉如”,“死没无复余”[10](《归园田居》其四)。魏晋以来,士人无端被杀者甚众,他们朝不保夕、人心惶惶,“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10](《感士不遇赋》)。动乱黑暗的社会现实同社会理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陶

渊明产生了心理矛盾。

华兹华斯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期望。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国家,但工商业的发展却摧残、毒害了农民的身心,农场经济迅速衰落,疾病和贫困蔓延,平静朴素的乡村生活遭到破坏。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拜金主义思想泛滥。华兹华斯对丑恶的社会现实感到非常忧虑和失望,从而长期对社会持有极端的批评态度。他在《无题:这尘世拖累我们可真够厉害》(*Untitled: 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 Late and Soon*)一诗中说:“这尘世拖累我们可真够厉害;得失盈亏,耗尽了毕生精力;对我们享有的自然界所知无几;为了卑污的利禄,把心灵出卖!”[21](131页)他在《漫游》(*The Excursion*)一诗中详细描绘了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最后酸楚地引用布鲁图的话说:“自由,我曾对你敬若神明,但是你原来是一个影子。”[4](44页)他在《伦敦,1802》一诗中说英国:“她成了死水污水池:教会,弄笔的文人,仗剑的武士,千家万户,豪门的绣阁华堂,断送了内心的安恬——古老的风尚;世风日下,我们都汲汲营私。”[21](199页)于是,他只好把死人抬了出来:“弥尔顿!今天,你应该活在世上:英国需要你!哦!回来吧,快来把我们扶持,给我们良风、美德、自由、力量!”[21](199页)华兹华斯对社会抱有理想,但“结果,除了绝望,他什么也没有挑到”[4](44页),“我生不逢时,不得其所”[20](《序曲》,58页),心理矛盾非常明显。

(三)生存与死亡。陶渊明热爱和执著于生命,期望它能长久甚至永恒,“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10](《读〈山海经〉》其五)。但他又清楚地知道,他所希冀的长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故云“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10](《饮酒》其十五)。亲友的相继去世加重了生死命题对他的折磨,其《祭程氏妹文》和《祭从弟敬远文》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表达了深切的失亲之痛。严峻的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生而必死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10](《连雨独饮》)。于是,心理矛盾油然而生,“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10](《己酉岁九月九日》)。《形影神》组诗充分流露了生死命题给他带来的困惑与苦痛。他在《形赠影》中

说,人的生命有限,刚见一人还活着,转眼逝去,再无归来之可能,推人及己,矛盾痛苦。他在《影答形》中说,他曾想寻仙访道,以求长生不老,但通往仙家之道过于渺茫,长生之路不通。想到身体消亡名声亦将不复存在,于是心潮起伏,不能自己。他在《神释》中说,男女老少都难免一死,无可奈何,只有听从命运的摆布。

华兹华斯也对生死命题产生了心理矛盾。他是个过早承受失亲之痛的人,年仅8岁时他母亲便去世了,几个月后他妹妹死去,5年后他父亲又去世,约翰·华兹华斯、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等亲友亦先他而逝。人生而必死的现象使他内心充满了“模糊的绝望感……时时袭来的对苦难与死亡的意识”[22](38页)。当他看到友人博蒙特所画的皮尔古堡图时,图中风雨大作的情形使他触景生情,勾起对死难的海军军官弟弟约翰的哀悼:“如今我再也见不到含笑的碧海,再也无法回到当时的心境;我这伤悼的情怀会常新永在;……这阴沉的海岸,这凶狂暴烈的海洋。”[23](《哀歌》,282页)在《无题:昔日,我没有入世的忧惧》(*Untitled: 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一诗中,他虽没有直接表示自己对露西之死的感情,但他那不问世事的平静态度却已说明肉体毁灭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平静态度也把他绝望的心情衬托得更加突出:“昔日,我没有入世的忧惧,恬睡锁住了心魂;她有如灵物,漠然无感于尘世岁月的侵寻。如今的她呢,不动,无力,什么也不看不听;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21](237页)在《露西组诗》(*The “Lucy” Poems*)之一的《无题:三年里晴晴雨雨,她长大》(*Untitled: Three Years She Grew in Sun and Shower*)中,他对露西之死依依不舍,表现了淡淡的惋惜:“好快呵,露西走完了旅程!她死了,给我留下来这一片荒原,这一片沉寂,对往事旧情的这一片回忆——那旧情永远不再。”[21](73页)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各自所体验的生死矛盾是有一定差异的。儒家对鬼神之事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怀疑态度,“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7](《雍也》)。道家亦有重今生轻来世的特点,故在儒道文化中,只有此岸而无彼岸,奉行注重今生的人生哲学。在这种人生哲学影响

下,陶渊明把生死命题给他造成的心理矛盾疏导到了对有限生命的珍惜、热爱和对今生的充分享受上,故云“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10](《酬刘柴桑》)。与此不同的是,在基督教文化中,既有此岸亦有彼岸,死亡是人的最终归宿,是重回自然,肉体消亡、精神永存。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华兹华斯对死亡的认识是虽死犹生、万物有灵,死亡似乎并非十分令人痛苦。所以,在《我们是七个》(We Are Seven)一诗中,他借一小姑娘之口巧妙地阐释了这一观点。他在《露西组诗》中多次写到露西之死,她生前不为人注意,死后无人忧虑,她的灵魂在自然中得到永生,她的精神在宇宙中得以永存。

二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在心理上的诸多心理矛盾表露了他们深层的悲剧感、孤独感、疏离感和焦灼感,而他们也总是试图消解这些矛盾冲突,使心理趋于平和宁静。他们的心理矛盾在消解方式上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隐居世外、寄情山水、文学活动、描绘乌托邦,等等。

(一)隐居世外。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不得志的文人学士在孤云野鹤、湖泊大川中寄托痛苦灵魂和宣泄心理矛盾的现象。儒家积极入世的主张虽具有积极意义,但它极大地束缚了人性,主观个体与社会客体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异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4](《骈拇》)。早在先秦就有先圣发出呼唤自然的声音了,孔子提出“君子见大水必观焉”[25](《宥坐》),荀子强调“山林川谷美”[25](《强国》),老子主张“法自然”[17](第二十五章)。庄子主张投入自然享乐山水,“使我欣欣然乐与”[24](《知北游》),“就蓺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24](《刻意》),超越世事,遁入内心,以寻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为最终归属。陶渊明生活在一个篡乱迭起的时代和一个与自身日益分离异化的世界,“同日斩戮,名士减半”[26](《王

凌》),心理上笼罩着一层浓重的忧惧感。当他纯洁的心灵反复经受痛苦折磨之后,便产生一种要求解脱的强烈愿望,“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10](《感士不遇赋》),企图找到一副能够暂时冲淡苦闷与悲哀的安魂剂,以求得相对的心理平衡和精神安慰,隐居世外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华兹华斯受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哲学家卢梭的影响很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尖锐地指出,社会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成反比,文明的演进是以人的善良天性和主体精神的丧失为前提的。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创建人赫伯特·斯宾塞则把社会叫做“社会森林”,认为弱肉强食是其普遍规律。这样,社会就成了个披着文明外衣的血腥竞技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针对社会的种种弊端,卢梭很强调人性的善良纯真状态,强调精神的平等自由及个性的解放,并提出了回到自然的主张。在卢梭的影响下,华兹华斯早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曾与友人徒步漫游了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等欧洲国家的山区。他在有着诸多心理矛盾之时,最终从都市生活中退了出来,同妹妹多罗西来到英格兰南部多塞特郡的雷斯唐农庄,过起隐居世外的生活。隐居世外成了他宣泄痛苦、化解矛盾冲突的重要方式之一。

陶渊明的隐居世外和华兹华斯的隐居世外有所不同。陶渊明是以儒道两家的思想作为立身准则的,他在心理上有着诸多矛盾冲突时,老庄思想成了他有效的心理调节剂。由儒家入世之道带来的心灵撞击,用道家的达观哲学来消解,充分体现了儒道互补、相反相成的平衡作用。他在失意之时愤世嫉俗,奉行老庄避世之道,却始终不能彻底摆脱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身在山林田野,心怀现实社会。故有《读〈山海经〉》其九其十这样的诗篇,雄壮、刚健和悲慨,给人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7](《步出夏门行》)之感。同时,他还始终无法忘怀儒家“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7](《季氏》)的训诫,不弃于仁义的修养,故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10](《咏贫士》其四)。其《咏贫士》类的诗篇,冲淡、自然、清奇,给人以“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28](《远游》)之感。

(二)寄情山水。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有失意

文人通过采撷自然景物消解人生痛苦的现象。微风细柳、鲜花芳草、鸟鸣泉响、青天碧水、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风花雪月、长河落日等美丽的自然景物可为他们带来感官的愉悦与欢乐,还能转移他们的视线,让他们忘却内心的烦恼和痛苦,求得心灵的平衡和宁静。陶渊明生长于东晋江州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从小生活在广阔的乡村,朝夕和山水田园接触,庐山、鄱阳湖的山光水色陶冶了他的审美情趣。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开章即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流露出了他热爱自然的天性。一方面,他从“丘山”中获得了巨大审美愉悦;另一方面,他又以“丘山”为媒介,转移了心理上的矛盾冲突,“世与我而相违”[10](《归去来兮辞》),“林园无世情”[10](《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他尚未离开仕途时,总有一种为人所羁的感觉,“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10](《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但当他远离污浊的社会回归自然后,却感到获得了归宿,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0](《饮酒》其五)的悠然自得的生活获得了自由宁静的心境。

华兹华斯生长于英格兰西北部坎伯兰郡的科克茅斯湖区,在这里的山峰丘陵谷地间,湖泊星罗棋布,湖光肃穆,山色深沉,养育和陶冶了他的审美情趣。他在《序曲》中说,当他还在襁褓中时,百鸟的啼鸣、淙淙的流水就和着乳歌渗入他的心灵。成年后他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但他仍旧醉心于山川河流,着迷于花鸟草木。他在《无题:我一见彩虹高悬天上》(*Untitled: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a Rainbow in the Sky*)中说:“我一见彩虹高悬天上,心儿便欢跳不止”[21](3页),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看到美丽的自然景物的喜悦。他认为大自然美丽的景色有治愈心灵创伤的能力,如在《水仙》(*The Daffodils*)中,他首先把自己比喻成“山谷上空悠悠飘过的一朵云霓”[21](75页),反映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云霓在天空中是自由不羁的,表达了他渴望寻求精神归宿以安慰受伤心灵的心情。接着他在诗中说,那一望无际、连绵不断的金黄色小花在湖边迎风飘舞,顿时把他的孤独和忧伤一扫而光[29](82页)。象征自然美景的水仙甚至给了他一生的慰藉:“从此,每当我依榻而卧,或情怀抑郁,或心境茫然,水仙

呵,便在我心中闪烁——那是我孤寂时分的乐园;我的心灵便欢情洋溢,和水仙一道舞蹈不息。”[21](77页)最能反映他借自然美景抚慰心灵化解痛苦的诗当属《廷腾寺》(*Tintern Abbey*),他在该诗中说,在他困于斗室的孤独,苦于都市的喧嚣,倦于理想的追逐之时,自然景物鲜明的影象便翩然而来,给他欢愉,使他激动,让他康复,人生的一切迷茫和痛苦都趋于轻缓。

自然在陶渊明和华兹华斯这里具有不同的内涵。华兹华斯的心中常有三层意识,第一层是上帝的灵魂,第二层是大自然的灵魂,第三层是人的灵魂。在华兹华斯看来,上帝的灵魂存在于自然,上帝的精神在自然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而人的灵魂又是依赖于自然界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英美几代批评家都共同承认,在华兹华斯的理解中,自然完全等同于上帝。走向自然,便是投向上帝的怀抱。他认为社会中所缺乏的人性在自然中可寻到,热爱自然就是热爱人类。

(三)文学活动。文人学士在人生不得意的情况下,常转而从事文学活动,借以排遣心中的苦闷,化解心理矛盾。陶渊明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中说“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把读书视为同世俗相对抗的事情。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明确提出读书的目的应是为了赏心悦目、心领神会和期与古人心灵冥合。他从读书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他写道:“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10](《答庞参军》)“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10](《五柳先生传》)读书的乐趣分散冲淡了他的心理矛盾,他明确指出:“乐琴书以消忧。”[10](《归去来兮辞》)在风云变幻、黑暗动荡的社会中,他“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30](《访陶公旧宅》),只有利用文学创作来排忧解难、抒发情怀了,“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10](《五柳先生传》)。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文,现存诗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文12篇,计赋辞3篇,韵文5篇,散文4篇。这些诗文中仅有约1/5创作于他出仕前和出仕期间,其余的则创作于他隐居之后。

华兹华斯的父亲是个通晓诗书之人。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他自小就阅读莎士比亚、弥尔顿等

大文豪的作品,培养了文学兴趣爱好。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写过300多首十四行诗歌咏他对少女萝拉的爱情,华兹华斯在《无题:别小看十四行;批评家,你皱起双眉》(Scorn Not the Sonnet; Critic, You Have Frowned)一诗中大谈十四行诗的好处,认为彼特拉克依靠他的十四行诗抚慰了他爱情的失意和苦痛。华兹华斯在此表达的观点是,文学创作具有消解作者心理矛盾的作用。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文,主要著作有《黄昏信步》、《写景诗》、《抒情歌谣集》、《两卷本诗集》、《漫游》、《彼得·贝尔》、《达顿诗十四行诗》、《华兹华斯杂诗集》、《序曲》、《隐者》和《华兹华斯抒情诗选》。创作这些作品对于化解他心理矛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文学活动对于陶渊明来说还有特别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活动和修身养性有密切关系,“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7](《子张》)。文学活动和入仕也有密切关系,“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7](《子张》)。在陶渊明的潜意识中,文学修养是入仕必备的条件,文学欣赏和文学创作既可在他人入仕受挫时为他提供医治创伤的解药,还能为他于它日之复出积蓄力量。

(四)咏古和描绘乌托邦。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文学活动有一个共同点,即追忆过去和幻想未来,把失意情绪化解到陈旧的历史堆和虚幻的乌托邦中去。陶渊明的《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和《读〈山海经〉》十三首等追咏的是历史和神话故事,这些诗篇通过对疏广、疏受、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子车鍼虎、荆轲、夸父、刑天、精卫等的歌颂咏叹,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这些人物出现于现实社会的期盼,理想同现实的矛盾冲突得到了一些宣泄。在《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中,他描绘了一幅超越尘世、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桃源社会”图画。它从根本上否定了黑暗的现实社会,寄托了他美好的社会理想。《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等并非简单的复古主义和乌托邦作品,实际上它们都是咏怀之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作者在心理上的矛盾冲突。

华兹华斯生活于工业文明时期,但他的《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西蒙·李》

(Simon Lee)、《迈克尔》(Michael)和《露西·格瑞》等诗篇中所描绘的是未受工业文明破坏的田园生活,具有宗法制小农经济的特征,实际上是在咏叹古代社会。他在其后期创作中,把题材范围转向了希腊古典神话和英国传说,更具有复古倾向。咏古中的事物虽已成过去,但这些事物都是现实社会中所缺乏的,是对丑恶的社会现实的有力鞭挞,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如在《迈克尔》中,他描写了一个自给自足、落后闭塞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村生活,这种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是不真实的。迈克尔一家人身上具有节省、俭朴和忍耐等优秀品质,他们一家就在这里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充满天伦之乐的生活,这些都是华兹华斯那个年代所缺少的。又如在《罗布·罗伊之墓》一诗中,他将罗布·罗伊同罗宾汉相提并论,大加颂扬。罗伊是17—18世纪苏格兰高地的氏族首领、民族英雄和义侠。他率领山民起义,反抗民族压迫,劫富济贫,在苏格兰享有盛名,是“富豪的死对头,穷人的好朋友”[23](195页)。华兹华斯的这类咏古之作是对他所生活的时代贫富不均、正义不伸社会现象的间接揭露、批判和否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在心理上的矛盾冲突。

此外,陶渊明还有一个消解矛盾冲突的重要方式,这就是酒。在中国,酒与文学自古就有不解之缘,酒是文人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7](《短歌行》)。陶渊明一生好酒,“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10](《挽歌诗》其一)。酒使他忘却忧愁,超然尘世,进入一个理想自由的境界,“酒云能消忧,方此詎不劣”[10](《影答形》)。酒虽非为中国所独有,但它在英国文化传统中并未同文学发生密切联系,没有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故酒对于华兹华斯并不重要,它未能成为消解他心理矛盾冲突的一种方式。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静”中之“动”对其文学创作具有积极作用。华兹华斯是浪漫主义诗人,浪漫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是主观性,它偏重于表现主观思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他认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31](168页),这同中国“忧愤出诗人”说很相似,都强调心理压抑、心理波动、心理困惑和心理矛盾等强烈感情因素对文

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正如戴维斯所说的那样,“华兹华斯的诗根本上是充满了心灵斗争的诗”[22](38页)。一个人对人生、对现实的义愤愈是强烈,心理矛盾愈加尖锐,其文学创作的爆发力就愈猛烈,其作品的感染力就愈强烈,其作品的思想性就愈深刻。倘陶渊明一生踌躇满志,没有这诸多心理矛盾,必然创作不出表现其忧苦愤懑的咏怀诗和记录其隐居生活的田园诗,更创作不出其寄托心志的辞赋散文。同样,若华兹华斯一生春风得意,没有任何心理矛盾,绝对创作不出如此之多精美绝伦的作品。

“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24](《刻意见》),“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7](第四十

章)。“静”与“动”是两个矛盾体,“静”润育着“动”,“动”指向着“静”,二者互相激荡、互相转化。只肯定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精神气质中的“静”而不承认“动”是不全面的,而对其“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失诸偏颇。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精神气质由“静”和“动”两个侧面组成,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具有同等重要性。他们“静”与“动”的精神气质在其作品中也有明显体现:在他们的诗文中,既有奋进、光明、快乐、正义等精神的描写,又有消沉、忧伤等情绪的抒发;不仅有冲淡、自然、清雅之作,而且有雄壮、劲健、悲慨之品。二者交相辉映,和谐一体,由此构成陶渊明和华兹华斯诗文风貌的主要轮廓。

参考文献:

- [1] 龚自珍全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2]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 [3] 且介亭杂文二集[M]. 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4] H. Я. 季亚科诺娃.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M]. 聂锦坡, 海龙河译.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 [5] 金东雷. 英国文学史纲[M]. 上海:上海书店, 1991.
- [6] 王佐良.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 [7] 论语[M].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8] 孟子[M].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9] 朱晓鹏. 论孔子的避世思想[J]. 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6, (3).
- [10] 龚斌. 陶渊明集校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1] 诗经[M].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12] 商君书[M]. 诸子集成[Z].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 [13] 韩昌黎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8.
- [14] 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15] 而已集[M]. 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6] 吉川幸次郎. 中国诗史[M]. 章培恒, 邵毅平, 骆玉明, 贺圣遂, 李庆, 孙猛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6.
- [17] 老子[M]. 诸子集成[Z].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 [18] 周易[M].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19] 王佐良. 英诗的境界[M]. 北京:三联书店, 1991.
- [20] 吴恒富. 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 [21] 杨德豫. 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6.
- [22] R. T. Davis. *Literature of the Romantic Period* [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76.
- [23] 杨德豫. 湖畔诗魂[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 [24] 庄子[M]. 诸子集成[Z].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 [25] 荀子[M]. 诸子集成[Z].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 [26] 陈寿. 魏书[M].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 [27] 曹操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 [28]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29] 张义.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自然之恋[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增刊外国语文专辑), 1996.

[30]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1] William Wordsworth.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with Pastoral and Other Poems* [A].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2 [C].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6.

Psychological Fluctuations in Tao Yuanming's and Wordsworth's Temperamental Tranquility

ZHANG Cha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In the circle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it is customary to relate Tao Yuanming and Wordsworth to tranquility, and it seems that tranquility is the whole of Tao Yuanming's and Wordsworth's temperament. In fact, this is not the case, and there exists the equally important aspect of psychological fluctuations in their temperament, which is caused by their psychological conflicts. Their psychological conflicts are great in variety, various in clearing-up, and important in literature creation.

Key words: Tao Yuanming; Wordsworth; psychological fluctuation; psychological conflict

[责任编辑:张思武]

● 书 讯

张能甫博士《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张能甫副教授的博士论文《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最近已由巴蜀书社出版。

郑玄是东汉时期有名的学者,其注《毛诗》、《三礼》等,不但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注释语言词汇本身也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故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张能甫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史博士学位期间,勤奋研读郑玄注释,在著名学者赵振铎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这部约26万字的专著。该书除了前言,共分三章(第一章《单音词的历史层次与基本词》、第二章《复音词的历史层次研究》、第三章《新词新义研究》),对郑玄注释语言词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到的见解。

该书收入四川大学“211工程”项目《汉语史研究丛书》。《丛书》由著名学者项楚教授主编,已出版五种。除张能甫《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还有雷汉卿《〈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杨文全《近百年的中国汉语语文学辞书》、董志翘《中古文献语言论集》和管锡华《〈史记〉单音词研究》。《汉语史研究丛书》出版以来,已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大明)